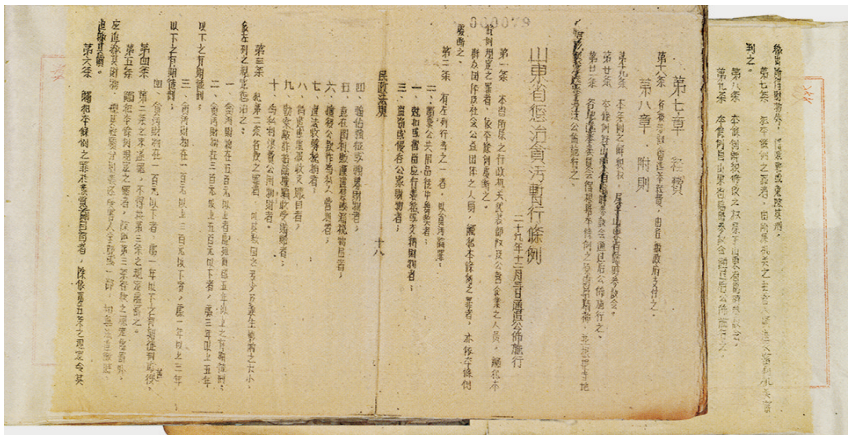


抗战时期山东抗日根据地作风建设

□ 李世华



1940年12月3日颁布施行的《山东省惩治贪污暂行条例》

抗战时期，山东党组织带领山东军民逐步建立起全国唯一基本以省为范围的抗日根据地。在山东省档案馆馆藏中，山东党政军群建立及发展壮大的档案较为完备，在全国具有一定代表性。其中有些珍贵档案资料，如《山东省联合大会特刊》《山东省战时法规政令汇编》《起来！为伟大人民办事！》《山东省惩治贪污暂行条例》等真实反映了山东党组织一以贯之狠抓作风、以优良作风赢得人心的历程，彰显了山东抗日根据地作风建设的独特优势和成效。

“严防其脱离群众”

山东党组织在领导山东军民的抗战中，始终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密切联系群众，建立了同广大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1940年7月，山东省各界代表联合大会开幕，大会历时1个月，会议选举产生了山东省临时参议会和山东省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山东统一的抗日民主政权的成立，标志着山东抗日根据地正式形成。会后出版的《山东省联合大会特刊》收录了大会近百份文件资料，完整记录了大会盛况，其中一份是《山东共产党八路军代表黎玉致词》，鲜明提出：“中国共产党山东分局与山东八路军是坚决为以上抗战目标与任务而奋斗到底。坚决与山东三千八百万民众共患难，同甘苦”“为山东人民的生存与幸福而奋斗到底！”还有一份是《战斗中的山东人民——李竹如八月五日报告》，李竹如振聋发聩地指出：“严防群众领袖的自高自大或自满，严防其脱离群众，防止其新官僚主义的生长。要使得大大小小的群众领袖都能够正确的了解：在你能够代表群众、为着群众的时候，群众可以将你高高的（地）举起；但是当 你脱离群众、不能为着群众的利益的时候，群众也可以重重的（地）将你放下。”一个高高地举起，一个重重地放下，反映了群众对待领导干部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

山东省档案馆馆藏中还有一份手稿，是1944年《鲁中区民主善政通讯》，开篇一段话即是：“自从抗日民主政权诞生的那天起，就没有一件事，不是为了老百姓的，在环境较好时是如此，在环境恶化时也是如此。

在基本地区如此，在敌游区也同样是如此。”“四个如此”生动勾画了党领导下的山东各级抗日民主政权一心为民的良好形象。

通过这三件档案可以感受到，山东党组织始终把人民利益摆在至高无上的地位，最终赢得了人民群众的高度信赖。

“要提倡说老实话，要实事求是”

在整风运动中，山东汲取延安和其他抗日根据地的教训，使整风运动健康扎实、富有成效。中共中央在《关于反对反奸斗争“左”的错误给各地的指示》中肯定了山东的做法：“不管反省任何问题，要提倡说老实话，要实事求是，反对哗众取宠，牵强附会，夸大其词。山东分局运用这种坦白方法，取得很好的经验。”

根据中央部署及刘少奇的指示，山东党政军领导同志带头深入基层调查研究。黎玉在沂蒙山区调研时，与农民同吃同住，发现各级组织干部群众观念不足、对减租减息认识不到位，发表了题为《起来！为伟大人民办事！》的讲话，发出了“民主政府是站在人民头上统治人民的衙门呢？还是由人民选出，为人民办事的机关呢”等对政府干部的“四问”。这“四问”在根据地广为流传，推动了减租减息政策的全面落实见效。

此外，为克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胶东行署规定“文件须附具体执行方案”，杜绝空泛指示；鲁中军区要求工作汇报“用数据说话”，如1944年

大生产运动中，开荒面积需经实地丈量，增产数据由群众代表签字确认等，这些求真务实的举措促使山东抗日根据地在经济建设、文化教育、司法建设等方面均有开创性贡献。

“做到不浪费一粒米、一文钱、一缕布”

1940年11月，全省行政工作会议召开，关于此次会议的档案，留存下来的有《黎玉：在全省行政会议上的闭幕词》，其中提到，“新民主主义的政权要有新民主主义的作风”“要廉洁奉公，就要能过艰苦的生活”，奠定了各级政府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的基调。

在根据地，各级领导干部率先垂范，厉行节约。1943年10月，《大众日报》报道了黎玉个人省吃俭用计划，包括：每日粮食由2斤6两减至1斤4两；省出细粮给伤病员吃；自配墨水；用大众电讯纸写便条、便信等。在领导同志带动下，根据地从上到下形成了“用最少的钱，办最多的事”的过紧日子信条。

各级机关制定了切实可行的节约举措，如胶东、清河区《主署机关1942年下半年生产节约工作计划与办法》，这份档案在办公用品、服装鞋袜、粮秣、医药卫生等方面要求非常细致。如在节约办公用品方面提出，办公纸张一律用小版纸，并且要两面用，非特殊情形不用大版纸、牛皮纸；用旧书旧报做稿纸或便条，个人学习用纸一律自备；信封要用四次，信纸可用两次。服装鞋袜方面提出，服装换下一律交公，换新时要交旧等。

1942年2月7日，山东省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发布《关于实行精兵简政的决定》，这份档案特别强调要缩小编制，减少单位，同时建立正规工作制度，提高工作效率，其中“做到不浪费一粒米、一文钱、一缕布”，让厉行节约的要求具象化了。此后山东抗日根据地先后进行了三次精简，提高了工作效率的同时，大大减轻了人民负担、改善了群众生活。

“严惩贪污分子”

1940年8月，山东省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颁布的根据地宪法性文件《山东省战时施政纲领》中，将“严惩贪污分子”作为一项重要的革命纲领，山东抗日根据地相继颁布了一系列规范财政收支、惩治贪污腐败的法规制度，大部分以法令汇编的形式留存下来，其中包括山东省政府秘书处翻印的《山东省惩治贪污暂行条例》，汇编收录的两份惩贪文件，对惩处贪污行为要求非常严格。一份是1940年12月3日颁布的《山东省惩治贪污暂行条例》，将贪污列为重大犯罪，其中规定：“贪污财物在五百元以上者处死刑或五年以上之有期徒刑。”一份是针对粮食这一党政军民的生命线制定的专门反贪条例，即1943年8月1日施行的《山东省惩治贪污公粮暂行条例》，其中规定：“贪污公粮在五百斤以上者处死刑、无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根据地民主政府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做到了令出法随，严惩不贷。如1942年6月，费南县政府二科仓库主任王俊德，私造收据，贪污田赋税收公款1250元；费南县秘书处某军用代办股长，利用公款贩卖流通券，从中贪污1340元，均受到了严肃惩处。《大众日报》报道了相关处理情况。

在中国共产党一心为民、艰苦奋斗、廉洁奉公、求真务实的作风建设实践中，山东党政军民一起，谱写了党群同心、军民情深、水乳交融、生死与共的历史壮歌。

（作者系山东省档案馆长）



袁庚于1917年4月出生于广东省宝安县，1939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9年，袁庚率领两广纵队炮兵团解放包括蛇口在内的珠江口沿海岛屿。新中国成立后，袁庚先后赴越南、印尼雅加达等地工作，积累了大量外事工作经验。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掀开了改革开放的新篇章，改革的一支“试管”就选在了袁庚率部解放的南海岛屿，他在这里建设了新中国第一个对外出口加工区——蛇口工业区，创立了“蛇口模式”。

打响中国改革开放山“第一炮”

1978年，中央层面一次次走出国门考察，探索建立对外开放型特区的思路日渐清晰。时任主持交通部所属香港招商局工作的袁庚组织起草《关于充分利用香港招商局问题的请示》，提出24字经营方针：“立足港澳、背靠内地、面向海外、多种经营、买卖结合、工商结合”，争取5至8年内将招商局发展成为综合性大企业，提出应该“冲破束缚、放心大干”。与此同时，中央港澳经济考察团呈报了《港澳经济考察报告（汇报提纲）》，分析了港澳经济发展迅速的几个原因，提出广东省宝安县、珠海县紧邻港澳，发展出口商品生产条件十分有利，其他地区都比不上。中央领导当即表态：“看准的东西就要动手去干，就要抓落实，把它办起来。”

袁庚以其敏锐的洞察力和前瞻性的战略眼光，捕捉到时代赋予的机遇，在面对香港土地资源紧张、寸土寸金的现实状况，他大胆提出在临近香港的广东沿海地区建立工业区的创新设想，旨在充分利用国内相对廉价的土地和劳动力资源，同时便捷地引入国际资金、先进技术和优质原料，实现优势互补、协同发展。这一设想得到了中央领导的批示同意。1979年，袁庚被任命为蛇口工业区管理委员会主任。大幕拉开，华章续起，中国改革开放开山“第一炮”在蛇口工业区微波山边炸响。在随后的几年时间里，蛇口凭借着敢为人先的精神，创下了24项全国第一，用制度破冰，点燃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星星之火。

提出“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

在深圳蛇口港附近的路口，一块标语牌立在一片绿地上。上面有几个金色的大字：“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这其后成为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最为响亮的口号之一，也是“冲破思想禁锢的一声春雷”。这条口号最早正是源于袁庚在蛇口推行的分配体制改革。

蛇口创业伊始，工人们干劲并不高，每人每天8小时运泥仅为20至30车。为了刺激干劲，工程处决定实行定额超产奖励制度，每天55车定额，每车奖2分钱，超额每车奖4分钱。工人们干劲大增，每人每个工作日运泥达80至90车，多的甚至达130余车。1981年袁庚从香港开会返回蛇口的路上，回顾工业区建设经历，想到了分配体制改革的“四分钱奖金”机制，受到启发，随手在稿纸上写下几行字：“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顾客就是皇帝，安全就是法律，事事有人管，人人有事管。”经过开会讨论，决定口号上墙，商议将没有争议的前两句口号亮出去。虽然当时有人借广告牌“扣帽子”，但他们顶住压力没有摘除广告牌，成就了特区改革开放亮丽“风景线”。1983年7月，在袁庚的推动下，蛇口工业区率先打破平均主义“大锅饭”，实行“基本工资+岗位职务工资+浮动工资”的工资改革方案，基本奠定了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分配制度。

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金融创新

20世纪80年代初期，蛇口工业区一位细心的财务人员发现，在同一家银行里，同是工业区的辖属企业，有的在往银行里存钱，有的在寻求贷款，如此一进一出，工业区损失了一部分利率差。“肥水何不留在自家田呢？”1984年，全国第一家企业内部结算中心在蛇口工业区诞生。1985年，结算中心升格为财务公司，进一步扩大了工业区的融资渠道。1986年，袁庚正式向中

袁庚：『蛇口模式』的创立者

□ 方敏

国人民银行提出申请创办招商银行。袁庚认为，中国金融体制不仅需要大银行，也需要地区性的中小银行，让蛇口这个“试管”为中国金融体制改革提供一点经验。在中央支持下，招商银行顺利获批。招商银行实行董事会领导下的行长负责制，引进了规范的风险管理办法，打破了当时国有企业深受制约的条条框框。

1987年，袁庚再次向中国人民银行提交报告，要求再做一个“金融试验”，在保险领域撕开个口子，让蛇口社会保险公司突进去，当一条“鲇鱼”。由此，1988年5月27日，全国第一家股份制保险公司——平安保险开业，第一次将竞争机制引入中国保险领域，将中国保险业推向了市场经济。至此，在中国南海之滨的蛇口工业区，诞生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话语下的现代保险业和银行业，迈出了金融领域向国际先进规则对接的重要一步。

探索住房体制改革，让建设者“居者有其屋”

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批商品房源自哪里？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在袁庚的带领下，敢为人先的蛇口便勇于涉水住房商品化探索，掀起了住宅革新巨浪。这一改革的契机在于工业区一夜之间引进了5万余名建设者，需要建设职工住房50多万平方米，粗略估计就需要投资1亿元，而国家对于蛇口全部建设资金的贷款只有6000多万元。袁庚等人认识到，原有国内住房状态不适合蛇口的现实，要通过改革住房制度，使人摆脱“铁板一块”的束缚，从企业体制中解放出来。

1981年，随着工业区第一批职工住房竣工，蛇口的住房制度改革正式开启，职工住房政策也从国家包、低房租的“大锅饭”制度转到按照成本计算租金的轨道上来，住多大房子，付多少租金，住房面前人人平等。

这一改革引发蝴蝶效应，袁庚继续推动了1984年的“租售结合”住房商品化改革探索。在没有任何先例的情况下，袁庚领导工业区以水湾头、荔园、招南小区为案例，尝试按照优惠价向职工出售住宅，制定《蛇口工业区职工住宅经营管理暂行规定》，设立优惠价、成本价和商品价。这一举措，成为我国现代意义上大规模产权住房制度的“头啖汤”。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开展党员教育的经验

□ 王继凯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党高度重视党员教育，视之为“党生存和发展之一个最重要的问题”。从党的创建和大革命时期立足于各地特点和革命需要的不同形式的初步探索，到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基于人民军队和工农政权的发展而逐步形成较为系统的教育培训体系，到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随着历史任务和党员队伍的新发展而在理论和实践上进一步发展成为，党较好地解决了党员教育这一历史性课题，积累了宝贵的历史经验。

突出政治教育，把好总开关。党一成立就明确宣布要把工农兵组织起来，宣传马克思主义，实行社会革命和阶级斗争的基本政治路线，并教育工人在实践中去实现共产党的思想。党的四大进一步把党的理论路线政策等政治教育提高到决定党和革命事业发展的战略地位。毛泽东在古田会议上进一步从理论上阐明了正确思想和路线教育对于建党建军的重大意义，提出彻底纠正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系统措施，强调通过教育改造“劣使党的组织确实能担负党的政治任务”，得到中央充分肯定并在各根据地推广，产生了深远影响。随着党员队伍的壮大，党适时提出党的建设伟大工程，把加强马列主义教育、完全实现党的布尔什维克化作为中心一环。为此，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增强党性问题的决定等文件，在全党普遍开展了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运动即整风运动，使全体党员和党的各个组成部分在统一意志、统一行动和统一纪律下组织起来，实现了在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全党新的团结和统一，为夺取全国革命胜利奠定了重

要思想、政治和组织基础。

面向斗争实际，解决现实问题。由于严峻的革命斗争形势和紧迫的任务要求，党员教育必须立足斗争实际，直奔现实问题。李大钊在北京秘密创办中共北方区委党校，针对当时革命问题进行培训，学员结业后立即奔赴斗争的最前线。此后各个时期出现的短期培训班多是如此。毛泽东提出支部建在连上以后，专门举办党员训练班，每期一两天或三五天，每期讲一两个问题，逐步提高党员政策水平。中央苏区建立后有了相对稳定的环境，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苏维埃大学等学制稍长，基本原则也是坚持为革命战争服务、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力争为反“围剿”作出贡献。国共合作抗战后，为使大量发展的新党员迅速了解党的基本理论和新政策，适应抗日战争形势的新发展，党在各根据地、游击区有计划地举办各类党校和训练班对党员进行系统培训。党校教育倡导“实事求是，不尚空谈”，并强调坚决反对“与了解中国社会情况、解决中国革命问题互相脱节的恶劣现象”。解放战争时期为了配合迅速发展的革命战争和土地制度改革运动，开展了以三查三整为主要内容的整党整军运动，目标十分明确，最大程度地调动了全党全军的战斗力。

创新方式方法，提高培训实效。党在各个时期根据需要灵活创办了各种类型的培训学校，有党校、军校、干部学校、训练班、综合性大学、各类专业学校等，相互结合，相互补充。1929年至1931年间，党在国统区举办了很多秘密训练班。在上海的中央训练班由周恩来直接策划、领导，

有严格的保密制度、工作流程和防范办法，并由特科负责保卫工作，最后由中央统一安排工作。由于环境险恶，时刻面临危险，培训方法必须高效管用。周恩来、恽代英、李维汉、李立三等都担任过教员，他们要预先准备对最近工作有时效的、系统的参考材料和讨论大纲，上课要逐一讨论问题，在讨论中纠正对相关问题的模糊认识或错误意见，形成正确结论。革命时期的各种教育培训，大都采用启发式、研究式、实验式、互动式等，要求做到中国化、通俗化、具体化，把马克思主义真理以灵活的形式真正融进党员头脑，并直接指导当前工作。

注重实践锻炼，培养工作能力。1935年底，中共中央在瓦窑堡会议上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策略和大量培养党的新干部的任务。这时，全国党员只有三四万人，但是中央没有急于求成，反而特别强调放他们“到斗争中去，使他们从斗争中学习”，而不是把领导才能每条都教好了才给他们以工作；对于他们在思想上工作上的错误，“不是轻易的给以打击，加上机会主义帽子，以及轻易的处罚他们，而是给以耐心的一次又一次的说服教育”“从斗争中求锻炼”。1939年，刘少奇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深入阐述了“革命的实践”对于教育改造党员的重要意义，强调必须结合当前人民群众的斗争去总结、学习和运用历史上的革命经验。毛泽东提出“把全党变成一个大学校。学校的领导者，就是中央。各地方党部、八路军、新四军、游击队，都是这个大学的分校”，并说这样的大学是延安独创，称之为“无期大学”，全党

同志都要进这个“无期大学”。在党的正确方针指导下，党员队伍不断壮大，到抗日战争结束时发展到120万人，而且质量得到了空前提升。

重视制度化建设，确保教育培训长效性。党很早就开始探索建立党员教育的领导管理机制，1923年成立教育宣传委员会，及至后来各级党部、支部或党的组织、宣传部门等，都负有一定教育培训党员的职责，并设立教育科、教育干事等具体执行机构。在长期革命实践中，党员教育逐渐形成主辅结合的基本载体和多样化的组织形式。作为基层组织的支部是“党的基本教育机关”，即进行日常教育的经常性机构，有明确的教育目标和任务，并详细规定了教育方针、教材编制、方式方法等；设立党校，则是为了开展系统性教育，从安源党校到在中央苏区建立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到延安时期中央党校和各地方党校得到长足发展，党校日益成为规模化培养党员干部的重要阵地；其他各类专门学校是加强党员专业教育的有机补充。特别是延安整风运动开创的党内集中教育，是党内教育的伟大创举。党员教育还明确了政治教育、理论教育、文化教育和业务相结合的内容体系，形成了定期学习、及时汇报、巡回指导、检查考评等管理办法。这一切都保证了教育培训取得长久实效，从而为党员队伍的不断发展壮大、党的革命事业不断走向胜利提供了坚实支撑。

